

试论中国近代化的概念涵义

虞和平

本文首先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特征出发分析了中国近代化的特点,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阶段,概括了中国近代化的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等特点,分析了这些特点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方式和结果产生的重大影响。

作者:虞和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一、中国近代化的特定含义

所谓中国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一般含义来讲,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是它的核心内容。但由于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下展开的,因此,它的核心含义还应增加一个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

殖民主义者把落后国变成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观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些落后国家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客观上却使这些落后国家在被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同时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者为了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它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为着保障和适合本国移民的利益和生活,它们必须使殖民地具有满足其需要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环境。如开办机械化加工厂、修理厂和矿冶企业,开辟新式交通运输业,扩大国际贸易,设立银行和发行通用货币,培养经济和政治代理人,在租界和租借地进行现代城市建设和推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出版西式书报杂志等。这就不可避免地按照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局部改造和影响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使旧的传统社会体制发生动摇乃至瓦解,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机会。

殖民主义者虽然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并掀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但是又竭力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从目的上来说,他们占领殖民地只是为了掠夺原料、开拓市场、积累资本。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这个目的,“贵族只是想降服它〔本文作者注:‘它’指殖民地〕,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在殖民地开办企业也是考虑到把殖民地“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本文作者注:‘他们’指殖民者〕有很大的好处”。^①从权利和利益上说,在殖民地由殖民者所开办的企事业当然完全由殖民者控制和享受,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人自己兴办的资本主义化企事业,殖民者也要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出发,以其占有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加以控制和干预,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永远受制和依赖于他们。因此,殖民者是“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的。^②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力图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化争取独立,但是由于缺乏各种社会基础,加之已经丧失主权,所以不得不服受制于殖民主义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不仅在方式上模仿殖民者的模式,而且在资金和科学技术上也要求助于殖民者。而殖民者在给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提供需求的时候，总是力图由此进一步掠夺和控制求助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既是抵制殖民地化的过程，又是加深殖民地化的过程，直至它们取得独立为止。

总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但却是一种依附性的、畸形的、难以完善的现代化。因为这种现代化实质上是在殖民主义者的控制和影响下进行的，而不是真正根据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本身需要而展开的。这种现代化不能形成结构合理和完善的工业体系，只能成为殖民者的原料产地、商品加工场和销售市场。这种现代化不可能建立健全的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现代化也不能完全体现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从根本上说，殖民者在对一个落后国家实行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尽管为这一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创造了某些物质和精神前提，但是他们“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取得独立才能在殖民者入侵时期所激发起来和积累下来的资本主义化的基础上开展和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本国现代化。犹如马克思在总结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作用时所指出的：“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②

由上可见，是否获得国家的独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否独立开展和全面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关键之一，它不仅成为这些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和前提条件，而且直接成为这些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国际关系的民族化与工业化、民主化一起，共同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涵义。

中国的近代化既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范畴，它的核心涵义中当然也少不了民族化。这不仅仅是由理论逻辑所得出的推论，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所证实的结论。

证诸中国近代化的实际历程，入侵的殖民主义者扮演了他们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他们的入侵，一方面使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②迫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把中华民族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使中国处于屈从的地位，并从中国掠夺走无以计数的财富，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化的畸形和低水平。且不说政治方面，就经济方面而言，在国际贸易上，中国处于严重的入超地位，到1936年累计入超达30.7亿元；且进口之物多为机器工具、原材料和机制消费品，出口之物则多为农副产品、矿产资源、半成品和手工制品，^③这不仅使中国的财源大量外流，而且表明中国已成为殖民者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工业上，殖民者已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结构中的主导因素。据1936年的统计，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总额的78.4%，他们已控制了中国的生铁产量的97%、钢产量的83%、机器采煤量的66%、发电量的55%、纱锭数的46%、线锭数的67%、织布机数的56%、铁道运输量的90%。^④在财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1页。

^② 此言出自美国总统麦金莱的顾问亨利·亚当姆斯之口，参见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上册，第442页。

^{③④}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政金融上，殖民者通过索取战争赔款、政治贷款和设立银行，使中国的财政破产，金融混乱，进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关税大权和金融市场。这一切都直接制约着中国本身的近代化进程，正如一些华商纱厂资本家所切身感受到的：“中国纱厂业的唯一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⑤因此，只有争取民族独立，在被压迫的“现状变化以后，”才能使民族工业“复兴和繁荣，”^⑥才能与外资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才能由中华民族自己主宰自己的近代化进程；才能收到列强在侵华过程中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自始至终都以民族化为—重要的动力和内容，只不过其程度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而已。

二、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和阶段

一般说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启动。在鸦片战争之前，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体系、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都有所发展，但是这一切都未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而且使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面临严重的考验，触发了中国人追求近代化的欲望。如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家提出了“采西学”、“设局厂”、“制洋器”、“改弊政”的主张，力图富国强兵，抵御外敌，显示了中国人追求近代化的思想倾向。把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定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缘由正在于此。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就是在1840—1949年期间中国所从事的现代化，历时百余年。从现代化发展阶段理论来看，中国的近代化从大阶段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开放之后，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可称为第一阶段，即近代化的准备阶段。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进入第二阶段，即正式启动阶段，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仍处于过渡状态之中，未能进入第三阶段，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

中国人对近代化的追求，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面临入侵强敌而作出初步的思想反响之后，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迈出了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洋务运动。这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虽有较强的保守性，但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并模仿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开办新式企业，使随着西方侵略而来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扎根。它以“求强”开其端，继之以“求富”，终之以求“议院之制”。其目的虽然有对付人民起义，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试图抵御外敌侵略，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探索议院政治的一面。这说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不仅已开始了近代化含义中的民族化和工业化活动，而且在民族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产生了民主化的思想萌芽。但是，洋务运动由少数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旧式官僚和绅商发起、领导和实施，并未成为真正的国策，未能成为上下一致的全国性运动；在现实中也只是单纯而有限地引进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开办新式企业。因此，洋务运动是一种局部的、严重畸形的近代化运动，其“自强”实践尚属可嘉，其“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511页。

③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64、72页。

④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有关数字。

⑤⑥ 《申报月刊》第4卷第2期。

产”结局实属可训。

继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的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是戊戌维新运动。这次运动提出了“兴民权、”“开制度局”、“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颁布了设立农工商总局和路矿总局等新式机构、提倡奖励工商实业、改革科举制度、开办新式学堂、提倡西学等项法令。它以挽救甲午战败而带来的民族危亡为出发点，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主旨，以兴商兴学为实践途径。就维新变法的动机和范围而言，它已涉及了中国近代化的核心内容。但是，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开明旧式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真正掌握国家的政权，使这次近代化运动的浪潮没能冲破封建主义的大堤而一显即逝，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痕迹。

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新政”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构成了中国近代化正式启动的前奏。它从民族危亡感出发，企图通过“刷新政事”、“振兴工商”达到广开财源、维持统治、挽回利权、抑制外资的目的。如制定工商法规，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废除科举制度，发展新式教育，任用新型人才；改革政府机构，增设商部、邮传部、法部等新型机构；预备立宪，开办谘议局，支持提倡地方自治；劝办商会、农会、工会等利益集团，等等。从清政府策动“新政”的主观动机和规划来看，它的重点是以振兴工商为核心的工业化，对民主化和民族化抱消极应付态度，那么从新政所引发的实际社会变革来看，不仅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的第一个发展高潮，而且还出现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地方自治、君主立宪的高潮。因此，从新政时期的整个社会动态来看，基本形成了一种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上下呼应的近代化潮流，并使近代中国的民族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新政”的内容虽然没有超出“维新”的范围，但是使维新的蓝图大部分变成了事实，为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化作了较为广泛的准备。如果说“新政”时期在经济上基本符合了近代化启动阶段的标准，那么在政治上则仍未达到这一标准。因为起决定作用的皇权专制统治尚未推翻，传统的社会结构尚少改变，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尚未确立，迫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集团尚未掌握政权。所以“新政”时期的近代化仍停留在正式启动阶段前夕的准备阶段。

上述三次规模较大的近代化运动，虽然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了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但是如果以现代化发展阶段标准衡量的话，显然都处于准备阶段。其中，洋务运动的主要作用是给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拨动了机杼；维新运动点燃了资产阶级民主化的火种，“新政”显示了传统社会体制的松动。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进入了第二阶段——正式启动阶段。虽然辛亥革命并未真正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但是它使中国在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从社会政治因素来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象征的清王朝被推翻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权象征的中华民国诞生了，仿照西方国家的新式政府机构设置起来了，一系列的法规制订出来了，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获得了法律的承认。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大声疾呼“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①继而登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也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②从中央政府的工商部到各省政府的实业厅纷纷制订《实业计划》，召开工商会议，研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资产阶级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为基本“自为”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部分政权。社会上，数年间涌现出数以百万计的为“振兴实业”而奋斗的实业团体，资本主义工商业呈现出空前

的发展高潮。这一切，尽管不尽名实相符，尤其政治因素颇多反复，但是工业化、民主化的思想已渐入人心，近代化的社会动员已开始。由此可言，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从政府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化启动阶段的条件。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40年中，中国的近代化一直处于启动阶段之中。在这40年的近代化过程中，虽然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有所改变，在程度上有所起伏，在规模上有所发展，在成份上有所变化，如“五四”时期举起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使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更使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新的模式，开始了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交替，并逐渐取代资本主义模式的过程。但是从总的发展水平而言，一直没有达到现代化社会的目标，仍处于过渡状态之中。自民国成立而形成的启动近代化的初步条件，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但是总的来说，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干涉下难以完善，尤其在政治方面更是时进时退反复无常，从而使中国近代化进程不能形成始终如一的、万众一心的行动，形成既有所成就又不能完成的结局。

三、中国近代化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被动性。一般来说，凡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先现代化的西方文明的影响或威胁下而开始的，都带有被动的性质。对中国来说，这种被动性就显得格外显著。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文明根深蒂固，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在鸦片战争之前，即使有一些外来的文明，不是被同化而纳入中国传统文明体系，就是受敌视而驱逐出境。千古一系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使它形成了强大的皇权和顽固的农本思想。古代的辉煌成就和与外界的隔绝使它以“中央大国”自居，形成了盲目尊己鄙外的民族观念和固步自封的陋习。历朝历代的尊皇攘夷、重农抑商政策，既阻止了外国先进文明的输入，又抑制了本国现代因素的产生。直至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尚处于低水平状态，还没有产生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迫切愿望。因此，到鸦片战争为止，中国还不具备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只是在鸦片战争后，在外来工业文明的影响下，才逐渐产生了一些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当西方文明以武力强行进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刚刚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古老民族不仅不认识这位外来的不速之客，而且也不需要它，待之以鄙视冷淡，称之为“奇技淫巧”，既不能很快地改造自己的传统文明去适应世界的现代文明，也不能迅速地将来到的西方文明变为适合于自身环境的近代化因素。

另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明伴随着腥风血雨进入中国，使中国的官员和人民对它产生了一种对抗心理。从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后60年中——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进入20世纪之后的50年中，除日本侵华战争之外，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列强侵华战争。可见，20世纪之前，中国受外国的武装特别严重，中国官民对外国的对抗心理也特别严重，发生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化，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保卫民族和国家而不得不采用一些先进的西方文明，使近代化运动成为一种“御防性近代化”。例如在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中占主导地位

① 《民主报》1912年4月18日。

②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辞”第3页。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自强”图存，“保教”、“保种”、“保国”、“保民”、“实业救国”等口号，无一不是这种被动的防御性近代化的反映。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中国官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列强从“兵战”到“商战”的转向，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这种“被动性”和“防御性”也有所减少，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仍然存在，这种“被动性”和“防御性”也继续存在，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和思想仍在不断出现和发展，只不过其内容和程度有所改变。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这种被动性持续时间之长，在其他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是少见的。日本和俄国的早期现代化，在开始时也带有这种“被动性”和“防御性”，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自身社会基础与中国不同，在它们的前现代社会中已经存在着实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一、它们有着广泛地借鉴外国先进文化而又不失掉民族特性的历史经验，如日本之学习中国、俄国之借鉴拜占庭，这对它们接受外来的现代知识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第二、它们已存在着较为发达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工厂和手工业。第三、它们已形成了一个较为一体化的社会，城市化水平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农村与城市形成尖锐分化，拥有大量的流动的上层人士。第四、它们已有了较为发展的新式教育，在国家公务员和上层人士中已有许多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国民的识字率也已相当高。^①加之这两个国家受西方的侵略远较中国为轻。这一切使这两个国家能够在西方文明来临的时候，很快地变被动为主动，按照自己的意图大规模地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成功地吸收和改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本主义模式以适应自身现代化的需要，从而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由此可见，在近代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已比日本和俄国晚了一个阶段。日俄两国在早期现代化开始之前具备了启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启动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在外国工业文明传入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而且还不完备。这就势必造成中国近代化的长期被动性。

特点之二是复合性，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工业文明而进行的，这一方面使后进国家可以借用先现代化国家的先进技术乃至尖端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而有利于乃至加速它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土洋结合、新旧结合的多元结构，即原有的传统形式和引进的或新生的现代形式同时并存。这种不同时代和不同性质的因素并存于同一时代和同一事物的复合性，在任何一个后进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过，然而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表现得更为典型和持久。如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共存、大规模的现代工厂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并存、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与封建主义的官僚衙门作风并存、新式的利益集团与旧式的宗派组织并存等等。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在西方文明进入之前，中国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社会，而且长期不能完成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加之近代化过程中的长期被动性，使原有传统因素和外来的现代因素很难融为一体，往往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中的两种异质成分，既互相影响，又彼此对立；二是由于有些传统因素，内部存在着适应于现代化的某些因素，它们与外来的现代因素并非完全对立，既可以与现代因素并存，也可以被现代因素所兼容，即传统对现代的潜在适应性。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这种复合性也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边际性。一方面，它在西方工

^① 参见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中译本。

业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不得不向现代社会过渡；另一方面，在自身传统文明的阻碍下很难完成这种过渡，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际状态，出现了许多既非传统又非现代、既有传统因素又有现代因素的事物。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边际社会、买办和绅商之类的边际人物、“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边际企业，成份复杂的边际团体。

特点之三是非自主性。所谓非自主性是指自己不能独立自主地搞现代化，而是要依赖和受制于其它先现代化国家。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共有的特征，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造成中国近代化的这一特点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一方来说。他们向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目的，是为了掠夺原材料和开拓国外市场。因此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把中国局部地引上近代化道路的同时，始终以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永远置于他们的操纵下。

其次从中国看，由于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在政治上既丧失了自主权，又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主义因素，严重地妨碍着近代化的进程；在财政上已濒于破产，靠外债度日，没有独立进行近代化的经济实力。因此，尽管中国官民从事近代化的宗旨中带有很大成分的抵制外敌、挽回利权的动机，但也不得不依赖于列强。例如，在民间，以苛刻的条件借用外资开办新式企业；聘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依靠洋行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在官方，缺乏起码的自主性，每制订和修改一项涉外法规均需经列强认可，就是象制定《商标法》这样的与列强利益并无多大影响的法规也得征求他们的同意，更不要说象修订关税协定、改革币制这样的严重影响列强利益的事情了。

特点之四是非统一性。世界后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凡是比较迅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落后国家，都是在新式政府的宏观部署和计划下进行现代化的。这样有利于提高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效率，也有利于充分使用国内的有限资源和资金，更有利于分清轻重缓急，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日本就是典型的一例，1868年明治维新，废除了各藩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新型国家，从而迅速掀起了一个以“殖产兴业”为目标的全国统一的近代化运动。反观中国，则缺乏这种统一性，尤其是在1916—1928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尽管“新政”时期的清政府，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制订过振兴实业的规划，出现过象孙中山制定的《实业计划》这样的宏伟蓝图，但其结果，或因规划不切国情，或因政治动乱，均未能顺利实行，使中国的近代化基本处于一种混乱、自流的状态。加之西方列强在中国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也给中国的统一增加了困难。如果说在传统封建专制政体和封建经济结构下的地方割据还有利于资本主义萌生的暂时作用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已经产生下的地方割据已经没有任何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了。

上述中国近代化的四个特点，对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方式和结果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化时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出发点，否则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反常现象将难以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责任编辑：李国庆